



# 在一个碎裂的世界里写作

□艾伟

今天的现实充满了戏剧性。每天只要打开网络、报纸，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场域中。读过一本叫《煤老板自述三十年》的书，一部纪实性作品。里面有一个煤老板，在香港看到蜡像馆，觉得很好，也想搞一个。中国农民都各有首创精神，别人搞过的他是不想再搞的。于是他决定造兵马俑。但他也不能搞得和秦始皇一样，所以，他决定搞一个当代名人兵马俑。他制作了一大批中国明星的兵马俑，其中之一是那个很有名的很胖的女歌手。他也想制作篮球明星姚明，但姚明太高了，工艺上有困难，只好遗憾地放弃了。现代名人兵马俑落成开馆后不久，他出了车祸，断了两根肋骨。这位煤老板从香港请了个风水大师。大师在厂里转了一圈，对他说，兵马俑不能搞，太阴，想当年把秦始皇都克死了。于是这位煤老板就把这批现代兵马俑埋藏于深山。他戏言，几十年后又是一批文物。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现实的经验丰富、阔大、饱满，其中的滑稽、惨烈和惊悚经常让我目瞪口呆，同时也让我涌出这样的感慨，同现实比起来，我们的文学实在太苍白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既有的文学逻辑和人性逻辑难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是失效的。我们的书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如果要追究今天的状况，自然有其历史原因。曾经主导中国社会革命意识形态的是以“公”为核心的一种价值体系，它倡导公众“大公无私”。在这套价值体系中，私是必须去除的原罪。这里“私”的范畴是无比复杂的，它不仅是指私心、私利等，更指一切可以由个人支配的事和物，比如财产和身体。上世纪90年代，私人领域被打开，人的私心被合法化。但是，当原来的意识形态退出私人领域后，却没有新的有效的人心管理系统。社会的演进让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完全失效了，但它依旧是人们潜意识里认识中国社会、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框架，它统治一切的地位导致别的体系（如基督教、中国

的儒道）难以进入。于是当下中国社会就出现一个潘多拉盒子打开的群魔乱舞的景象。人心无法管理，人性的恶成为一个真理，人的德性反而成为难以彰显的需要隐藏起来的情感，否则会被调侃或嘲笑。

我相信善、勇气和尊严都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今天的中国，在精神价值领域可以说一片荒芜，到处都是肉感的气息，人们自得其乐地在一个很低的价值平台上滑行，怀疑主义盛行，大家几乎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普遍经验，我们无所依凭。面对这样一个普遍经验，要书写人类正面的品质竟然成为一件无力的、困难重重的事。我们无法庄严、宏阔、秩序井然。我们只能在更小的尺度和方向上，去描述这种人类的正面力量，和这些正面情感有细小的相遇。这或许是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处境和宿命。

每一代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面对这个时代，即使书写再困难，还是要去直面它。某种意义上刚刚发表的长篇《盛夏》（《人民文学》2013年第二期）就是这种困难的结果。在《盛夏》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就是柯译予。柯译予无疑是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他既是真诚的，同时也是虚伪的，他很自私，同时又很慷慨，他既有内心的柔软和挣扎，同时也是冷酷和无情的。各种矛盾的气质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是平行不悖的。这个疯狂的碎片似的世界把我们的内心也砸得粉碎。今天，我们身上的任何一种品质都经不起严格的检测。一个没有精神可以依凭的人看起来就像是“表演者”。柯译予似乎也是这样一个“表演”的人。

所以，我用了这么一个复杂的结构。在《盛夏》里，有三条线索相互纠缠，我在其中装入我们这个时代的重重疑难和矛盾，由此和柯译予这个人形成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我试图用柯译予的复杂性去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态的复杂性。身处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就像“盛夏”这个季节，充满了焦虑、不安和无名躁动，我们一片茫然，前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艾伟，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有罪》《爱人同志》《越野赛跑》，中短篇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水中花》，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曾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

代”与“经济时代”两个大段落。这样的划分是有创见的——迟至2005年，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出版时，相似的历史段落划分法才被再次使用，并引起热议。艾伟的这部长篇小说同样讲述了两个不同时代所存在的严重的人性异化：在“政治时代”里，人格被压降，尊严被铲平，步年只能以学马行走方可获得生存自由，四类分子只能在“天柱”这个虚设的空间里飞翔；“经济时代”里，欲望被释放，人性被屈抑，生活进入了博彩式的隐喻之中，天柱式的乌托邦亦不复存在。在对这段历史进行阐释时，他紧握“人性”的钥匙，解开了看上去纷繁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密码。他试图凭借超历史的“人性”范畴来荡涤政治、经济等历史现象，最终抵达对历史的永恒注解。简单地说，无论小说的叙事有多丰饶，情节有多逶迤，人物有多沧桑，艾伟面向历史的发问却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历史究竟是顺应了人性，还是屈抑了人性？历史在何处顺应了人性，又在何处屈抑了人性？尤其是，历史为何要屈抑人性？

作为这个价值逻辑的另一种体现，艾伟小说中不断出现以身体贬抑来获得精神救赎的自虐式人物。在《七种颜色的玻璃弹子》中，为了一颗玻璃弹子，少年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在《风和日丽》中，刘世军为洗刷曾为战俘的屈辱，十年如一日地独自一人在孤岛上守护灯塔；在《爱人同志》中，战斗英雄刘亚军不得不经受因年代更替而符号价值递减的精神痛苦，当他的尊严与外部世界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他竟引火自焚……这一组身体贬抑与精神救赎之间的对应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个人在历史或社会境遇中的位置与姿势。弱者在获取生存与尊严这些基本的人道指标时必须支付的身体剧痛，使艾伟的叙述不断传达一种不可名状的痛楚。无疑，艾伟的小说坚持了一种伦理质疑与伦理批判：不证自明的历史意志在碾过个体身体时，真的可以那么心安理得吗？势不可挡的群氓意志在践踏个人尊严时，真的可以如此横冲直撞吗？

我认为，正是这种清醒、坚定、锐利的批判意识，使艾伟的叙事摆脱了轻逸的美学抚摸和泛泛的道德咏叹，在对人性的不断反思中迈向了一个优秀作家所应具备的深刻。

## 以人性为依据的“历史分析”

艾伟是一个颇为全面的作家。他不仅有纤细的人性发现，同时还有独到的“历史分析”。当然，他所有的“历史分析”，全以人性为据。

他于2000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用一种看上去很繁复但实际上很简约的笔法，将从“文革”前夕到1990年代的中国历史划分为“政治时

■印 象

## “愿汝永远天真”

□黄咏梅

去年，电视剧《风和日丽》热播，我完整地看了一遍。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小说原著，不过，当电视配合画面很文艺地朗诵起“余愿意汝永远天真，愿意汝是屋项上之明月……”这首诗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很欣慰，这首诗保持了对原著作者、我的朋友艾伟的敬意，也保持了对艾伟这一代人曾有的理想和热血的敬意。我深知，艾伟写下这首诗，作为小说《风和日丽》的结尾，更多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寄语。

认识艾伟近10年，一直觉得他就是个天真的。现在，如果用“天真”去形容一个人，未必是褒扬，因为有了那个著名的“很傻很天真”的解构，当然，如果硬要用“天真”这样的词去形容一个中年人，还不免遭到“卖萌”的吐槽。可我还是要说，艾伟是一个天真的中年人。天真这种稀有金属保存在他的日常生活态度和写作生涯里，闪闪发光。

这个天真的，安于宁波一隅，读经典写小说是他的主要事务，在我的理解中，这也是艾伟处理精神事务的主要方式——无此，他不可能多年如一日地住在小城一统，早就被内心冲突的各种欲望驱驰，出门找钱、找乐去了。至于副业，眼见他捣腾得最有影响的几件大事就是：摄影和绘画，每每自得其乐，虚荣心爆发了，会将几幅作品放到微信上晒，收获几位朋友的夸赞，便天真地得到了满足。此外，他偶尔还练习罗大佑的歌，看看各种口味的艺术片，围观微博骂架，甚至写几首抽屉诗歌。这种极简而让他满意的生活，使他看上去总像能呼吸到特供空气，清淨、安逸，无过多的怨气，乐于接受命运的馈赠。往往，他获得的馈赠就比别人多，他在能见度极高的心里，看到了更多的悲欢离合、世道人心，他把它们一一呈现在小说里。

艾伟的天真，在于他深谙世相之后，仍旧能去相信，相信此际之外还有一个世界，相信人性中爱的力量，相信苦难中那些温暖的时光，并非虚构，也非偶然。在这个布满了怀疑的时代，相信是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啊，或者说，是多么天真的一件事啊。

因为如此，我总是能在艾伟的小说里读到一种挣扎着去相信的力量，这力量的释放与体会形式便是——深深的感伤，也是他小说的魅力所在。我很喜欢《风和日丽》里那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伍天安，他被青春的激情焚死，被理想的被褥包裹长眠，被天真的明月照耀。要是伍天安没死，我真不愿意去想象，他在21世纪的今天，混迹于这条激情殆尽的大马路之上，也许还腆着他的肥肚子，正盘算着到哪里消费，到哪里娱乐，到哪里可以寻找到弥补青春的地方……这是现实，但绝不能安放于伍天安的身上，艾伟舍不得糟践他。在艾伟的小说里，很多人物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天真”，是艾伟在小说里小

心翼翼地“宝贝”着的情怀，它不会随着题材的改变而消失，更不会随着年岁的增大而流逝，它是作家的一种信念。

每当我在网上遇见艾伟，他会跟我认真地聊文学。说实在的，现在能在一起谈文学的人实在不多，即使是打着文学研讨会的主题而从天南海北聚集在一起，也未必见得能真正地聊创作、聊文学。所以，我很高兴能在QQ上读到艾伟那些关于创作的“短句”——基本每一句话，都不超过15个字，而且一句紧接着一句。在面谈的时候，艾伟的讲话似乎没那么流利和迅速——他对写作总是显得那么饶有兴趣和诚心诚意。

话说回来，艾伟写了16年小说，长篇小说屡屡刊发在重要的文学杂志，并在文坛引起反响，但似乎还没拿到过一个“像样”的大奖。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他，没想到他哈哈笑了两声，抛出一句天真的话来——“我不着急的呀！”似乎，只要他一“着急”了，那些奖就像糖果一样都能被他揣到兜里了。我曾经在采访余华等作家时，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坛上，有一大群著名的“不获奖作家”，他们经历过从前那段写了小说而发不出来的“艰难岁月”后，小说能够发表、出版、传阅，给读者带来一点儿的触动，就很满足了。我想，艾伟应该也是由于拥有“满足”感，所以才可以“不着急的呀”。然而，“满足”并不等于失去了“野心”，实际上，艾伟的“天真”使他对写作充满了“野心”。一个写了16年小说的作家，至今，每次开始写一个小说都觉得好玩，都觉得很有意思，其原因在于——他又开始冒险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跟他笔下的人物一起活着，就像一个少年，怀着对未来的不可预见，又怀着对未来的可能性的信任，开始了他的历险记。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是，这个天真的野心勃勃地出发的作家，他的行囊里，装着沉重的感伤，因此，他不会炫技，也不会四处讨巧，他按照自己内心的结构图，朴素地行走，他又不懂得一边走一边卸下自己的包袱，以便将来能迈出潇洒的步伐，相反，他一边走一边捡拾，他的行囊越来越重了，他依旧很认真地背着，琢磨着那些——他固执地相信那是珍贵的馈赠——的感伤。

记得有一次在卡拉OK，一大群人，喝酒的、聊天的、手舞足蹈的，只有他一个人拿着麦克风，跟着荧幕上的罗大佑在孤单地唱：“有一天孩子们会告诉他们后代你们要守规矩，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这些陌生的旋律，或许你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这首歌在那样的场合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的听众也不见得有几个，可他依旧唱得那么投入认真，那陶醉的样子分明摆着是在藐视，他固执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的孤独的确是过于喧嚣的……



□王侃

所向往的那样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宏大叙事”。

《风和日丽》是对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反思。之所以用“反思”来定位这部长篇，是因为与艾伟之前的长篇《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中仅仅展示历史环境中的人性困窘不同，《风和日丽》想从某个历史原点出发，梳理出历史逻辑；同样是表现历史中的人性屈抑，但这一次，艾伟试图作出某种历史分析，给出某种答案，以使人们对历史有某种真理性的认知。因此，这部长篇不像之前的小说那样聚焦于人性的善或恶，而是直接将勘探的触头敲进了历史的壁垒，以发现由革命意识形态所浇铸的当代中国历史的伦理内核与推演逻辑，据此解释人物与历史发生冲突的缘分，由解释悲剧诞生的宿命，解释人性处境的必然。这部小说在一个主要层面上展现了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取向，它让主人公杨小翼从个人体验与个人悲剧出发，对已板结为集体记忆的中国革命史展开了祛魅式的重述，并为横跨半个世纪的“幽暗和卑微”，寻找最终的方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人性发现，还是历史分析，这部长篇小说都属不凡。

## 对人性的理想主义期待

艾伟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猜忌与冷漠是人与人之间的常态，一切道德上的正当性都会遭受质疑甚至被否定。这是他对当下世态人情的一种判断，我因此愿意用“黑暗”来形容他的世界观。他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小说都在叙写黑暗中屈抑的人生与变形的人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艾伟对世道有清醒的智性认识，但对人性却持有理想主义的期待。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叙述历史与现实，与“新生代”普遍对当下感、现时感的强调不同，艾伟更注重对历史的眺望与涉渡。他用“寓言”这一现代主义方式使小说溢出了美学与感性的畛域，涵盖了民族、国家、人类、人性等意识形态范畴，从而使小说重新进驻历史现场，进入“深度”之中。

的确，一直以来，艾伟都是个有野心的作家。他即使写一个村寨，也是为了在终极处指向民族和国家，他即使写一个人，也是为了指向人类，即使写一个时代，也是为了指向历史。他不只一次地试图借助“寓言”，努力让具体、多变的“经验”指向抽象、永恒的“存在”。因此，他的小说不会停留在细部和局部，不会停留在对人物命运的迂回曲折，不会停留在对人性伤痕的审察与摩挲上。于是，在2009年我们等到了他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我将这部长篇小说视为艾伟在叙事史上的一次“远征”。因为这部长篇，我认为，某种意义上，艾伟已经有理由如自己

所希望的那样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宏大叙事”。《爱人有罪》是在人性深渊里的一次道德历险。俞智丽这个人物无疑会引发争议，因为在充满怀疑的时代里，一个富于宗教感的道德圣女不仅是不可感知的，几乎还是不可想象的。或许，会有一些意见认为俞智丽的坚忍其实不过是性格的软弱导致，另有一些意见则可能认为是“原罪”这样的宗教感支撑了俞智丽的救赎行为。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在艾伟的写作意图里，是他对人性至善一端的充分信任，才使他对俞智丽寄予了顽固的期待；她并不软弱，也并非无助，而是反，她本身就是人性的光芒。

对于人性的这种理想主义憧憬，也使《风和日丽》这样沉重的叙事始终存有亮色。这部小说有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将军尹泽桂。这个人物，有诸多和普通人相似的身份，是多种身份的集合体，是恋人、丈夫、父亲、外公、朋友、同志、官员、军人、诗人等等。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他是“革命”的符号，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完美体现者。他身上布满革命的凿痕，却鲜有人性的温度。他遵从革命伦理，克制世俗情感与欲望。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革命伦理所能允许的狭窄空隙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他作为父亲、外公、诗人等角色的温情一面，以致于那个他一直拒绝相认的私生女杨小翼最终也在某个时刻与他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与和解。显然，艾伟总是相信人性会在某个时刻胜出，而不会永远匍匐着；他相信人性自有其规律，它脆弱但又坚韧，敦厚而智慧，既讷讷又敏，无处不在；他相信人性总是蓄势待发，而在屈抑中闪现的人性光芒必定有着更为动人的品质。我相信这是艾伟塑造尹泽桂这个人物的缘由。

读艾伟的小说，有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雨果和狄更斯。他的《乡村电影》让我想起《艰难时世》，《越野赛跑》让我想起《艰难时世》；他的《回故乡之路》让我想起《九三年》；他的《回故乡之路》让我想起《雾都孤儿》，《爱人有罪》让我想起《悲惨世界》。他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让我想起奥列佛·特维斯特或者冉·阿让。他的小说既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坚硬质地，又有浪漫主义的温暖情怀。这其中，尤其是他对于人性的信念让我深为感动。其实在他看来，美好的人性并非一种浪漫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存在；人性也不是被悬置的价值理想，而是现实世界中直接予人勇气的力量。

无疑，我愿意为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文学喝彩。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